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1999
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1999 年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6

ISBN 7-80149-353-2

I. 中… II. 中… III. 近代史—研究—中国—文集
IV. K25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0010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青年学术论坛 1999 年卷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济 春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65139963 邮编100732)

网址: <http://www.sclph.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春雷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7.25

字 数: 426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353-2/K·035

定价: 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序 言	张海鹏 (1)
-----------	---------

太平天国后期的朝内纷争

——兼论洪仁 与李秀成之间的关系	夏春涛 (1)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	黄道炫 (17)
英国政府与 1924 年广州商团叛乱	张俊义 (48)

惠栋与清代学术	王法周 (64)
---------------	----------

辛亥前戴季陶的政治思想	贺 渊 (108)
-------------------	-----------

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认识

——章士钊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一个方面	邹小站 (122)
张东荪哲学思想的渊源	左玉河 (143)

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传播中的

唯物史观述略	赵利栋 (189)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	罗检秋 (215)
钱穆与胡适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史整理的思想交涉	
——以戴震研究为例	刘 巍 (236)
从《读书杂志》看中国社会史论战	李洪岩 (273)

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大学教育述论·····	金以林 (297)
简论北京中法大学·····	葛夫平 (334)
禀德方案与哈佛大学的汉学起源·····	樊书华 (369)
香港社会保障变迁·····	张 丽 (404)
中国抗战时期人口损失研究之我见·····	李学通 (415)
侵华日军暴行心理之解剖 ·····	卞修跃 (425)
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合作社·····	王士花 (452)
评三部梁后超思想研究专著·····	崔志海 (482)
潘光旦家庭问题研究述评 ·····	吕文浩 (525)

序 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1999 年卷，在我所建所 50 周年时问世，我感到由衷喜悦。这是我所响应李铁映院长号召，建设现代科研院所努力中取得的一点进步。所谓现代科研院所，当然有多种含义和衡量指标。照我的理解，首先是要有优秀的研究人才，要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我们通常所说出人才、出成果，当是指此而言。离开了优秀的人才和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所谓优秀的研究所云云，不过是无有之乡。因此，建设现代科研院所，我以为第一位的是要有人才。

50 年来，近代史研究所为我国历史学界培养和造就了几代杰出的学者，他们在发展、繁荣我国历史学园地、提高我国历史研究水平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在中国通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奉献了许多令我国学术界关注的著作和论文，编出了不少重要的学术资料。不用讳言，这些论著和学术资料对于中国历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到了良好的引导和推动作用。这是我们今天迎接建所 50 周年纪念时，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同样不用讳言的是，我所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困难和缺陷。多年来，老一辈学者常常慨叹，在近代史研究所，青年人才的成长呈现一种自生自灭的状况。这是说，研究所对青年人才的成长，缺乏有力的办法，显得有些束手无策、无所作为。一代一代青年就在这种无奈中或者脱颖而出，或者饮恨出

局。研究所当然不是专业教育机构，不直接负责对人的教育；但是，这并不表示，研究所在教育人、培养人方面不应该承担责任，只能袖手看到这种自生自灭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最近十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在研究所内培养和造就青年研究人才的办法。我们认识到，在研究所培养和造就人才不同于学校，不能按部就班进行，不能修学分，拿学位（除了攻读学位，而攻读学位，基本上是接受学校教育，不是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每个研究人员都有研究任务，或者是集体课题，或者是个人项目，都在埋头工作。这是基本所情。因此，我们只能在工作中，只能在研究实践中，考察人，观察人，培养人，造就人。离开这一点所采取的培养措施，都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长久，难收实效。通过研究任务，通过课题管理，通过会议切磋，造成激励机制，形成学术氛围，调动和刺激青年研究者的工作热情，推动他们在研究任务中沉下心来，深入下去，开拓各人的科研园地。为此，所里采取过一些办法，如规定新人进所，要求研究室指定老专家帮带，这是老师带徒弟的传统办法；所里制定过青年研究人员考绩办法，成绩优秀的给予奖励，这是以正面表彰的办法，激励青年人上进；积极在所里实行课题制，推动青年人承担课题，所里给予资助；推荐和介绍青年学者出国做较长时间进修、访问，以扩大其视野，提高外语水平；开办青年学者演讲会，每月定期请青年学者作学术报告；积极推动青年学者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讨论会，要求他们撰写合格的学术论文，同时，本所也积极筹措资金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推动青年学者与会。有时也举办所内的学术讨论会，严格按照国际会议的办法，训练所内青年学者等等。应该说，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且，大体说来反映较好。1999年开始，所里又推出一种新的办法，第一次召开了所内青年学者的学术讨论会。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积极响应，大多数人都撰写了论文。会议严格按照国际会议办

法，只是会议主持人、论文评论人都由青年学者担任。会后，请所学术委员会的老专家给予评议，写得好的论文，评出等次，分别给予奖励。这种做法，在所内反映良好。有的超过了年龄的朋友对于自己不能参加会议表示惋惜。这次出版的青年学术论坛，就是本所第一届青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为了免俗，我们名之为青年学术论坛。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近代史研究所现有 40 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将近 40 人，其中博士 16 人，硕士要超出这个数字。有一部分已经晋升为研究员，大多为副研究员。今后若干年，大约会保持这个数字，只是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还要增加一些。十年前我们担心的青黄不接的情况，现在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为了使逐年增加的年轻朋友继承近代史研究所的学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初步打算，把这种青年学术讨论会的形式固定下来，争取每年，或者隔年举办一次，争取每次都出版论文集。青年是我们的未来。研究所的未来在于青年，我国学术界的未来也在于青年。面对 21 世纪国内外学术界的发展，我们要努力推动我们的青年学者尽快地成长，使他们尽早为学术界所认识，所接受，争取使其中一些人成为 21 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名人、大师。为此，我们还要做出更多努力。比如还要在培养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下功夫，使那些即将成为知名学者的年轻人记住、并且发挥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刘大年等老所长留下来的传统，即不仅要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做学问，还要保持正确的研究方向，对国家、对社会抱有严肃的责任感。这是我希望，也是我所老一代学者的共同希望。

本书收集论文 20 篇，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发表。20 篇论文涉及近代政治史、中外关系史、教育史、社会史、学术思想文化史以及学术评论方面的内容。作者中有一位研究员、六位副研究员，其他是助理研究员；他们的研究是认真的、努力的，他们在

论文中的表现如何，研究能力与研究方法如何，他们的论点是否站得住，这就要请各位读者，请各位关心青年成长的前辈们不吝给予指正！

本书各篇论文，在青年讨论会后，又经各位作者修订。本书的编辑工作是本所黄春生、徐秀丽、刘红、曾学白、谢维、杜继东、王立新等做的，我对他们的劳动表示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在很短的时间里出书，我感谢他们的支持！

张海鹏

2000 年 4 月 26 日

于东厂胡同 1 号

鼐德方案与哈佛大学的汉学起源

樊书华

创建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驰名世界的汉学研究中心之一。哈佛大学的汉学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鼐德（Francis P. Knight）方案有着紧密的关系。正是鼐德方案及其实施，促成了哈佛大学在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设立中文讲座，开了哈佛大学汉学的滥觞。那么鼐德方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提出的，在当时产生了何种影响？又是如何实施的，其结果如何？鉴于哈佛大学在国际汉学界的独特地位，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探。

一、鼐德方案：关于在哈佛大学 设立中文讲座的建议

欧洲是西方汉学的重要发源地，其汉学研究由来已久。远在13世纪，经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介绍，中国已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到16世纪中叶，汉学在欧洲诞生。17、18世纪，欧洲在

本文的撰写承蒙哈佛—燕京图书馆前任馆长吴文津博士（Eugene Wu）、哈佛大学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光域先生和南京大学中文系张宏生教授提供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华传教士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大量著述，促进了汉学在欧洲的进一步发展。到19世纪，汉学在欧洲已成显学，各著名大学纷纷开设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在1814年设立了“汉族、鞑靼和满族语言与文学讲座”，1875年设立中国历史与文化讲座。法国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在1843年开设了“通俗汉语”讲座，为鸦片战争之后前往中国的通译、传教士和商人提供学习基础汉语的场所。牛津大学在1828年创建了英国的第一个汉语讲座。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 1814~1897）于1873年自中国退休返英后，于1875年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汉文讲座教授，并于次年开设中国语文课程。理氏在该校执教22年，一直到1897年去世为止。伦敦大学附设东方语言学校也开设了汉语课程，由毕尔（Samuel Beal, 1825~1889）于1877年担任首任汉学教授。德国柏林大学于1833年开设汉语课程。莫斯科附近的喀山大学于1828年开设蒙古语讲座，1837年增设汉语讲座。荷兰莱顿大学于1855年开设汉学讲座。^①

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汉学起步较晚。尽管美国在华商人和传教士撰写出版了大量介绍或论述中国的书籍，但是直到1877年2月翦德提出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的建议，美国还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设有中文讲座，开设有关中国文化的正规教学课程，也没有专门的学术团体开展汉学研究。美国东方学会（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虽然创建于1842年，但是其“东方”一词所指范围甚广，包括西方文化圈以外的广大地区，其中最主要的是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而在1915年以前，该学会的

① 参见国际汉学编委会编：《国际汉学》，第473、353页，商务印书馆，1995；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94、122、106页，文化出版社，1949；陶飞亚、吴梓明合著：《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第38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研究重点一直是古埃及、古印度、两河流域、波斯和阿拉伯、希伯来文化，对中国和中国文明未予重视。^① 耶鲁大学刚刚开始酝酿聘请从中国退休返美的传教士卫三畏博士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② 担任汉文讲座教授。可以说，戴德方案是最早的关于聘请中国教师在美国大学担任中文讲座教授的建议。

戴德，美国麻省波士顿人，为美国商人、驻华外交官。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增开营口（牛庄）为通商口岸后，戴德于1862年来此营商，为营口最早的美商之一。他与兄弟阿尔伯特·戴特 (Albert M. Knight) 等一起创办了营口旗昌洋行 (Knight & Co.)，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兼佣金代理业务，代理十余家欧美和日本轮船、保险及其他公司或厂商的业务。1877年前后，该行由美国驻营口署理领事及荷兰驻营口领事、英商班迪诺 (J. J. Frederick Bandine) 接办。自1862年起，戴德先后兼任美国驻营口代理领事、副领事、领事；1864年后又先后兼任瑞典、挪威驻营口副领事、法国驻营口领事、荷兰驻营口副领事、领事、代理德国和日本驻营口领事。^③ 1877年2月，在中国

① 《国际汉学》，第488~489页；William J. Brinker, "Commerce, Culture, and Horticulture: the Beginnings of Sino-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Thomas H. Etzold (ed.), *Aspect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784* (New York, 1978), p. 3~4.

② 卫三畏，美国传教士、外交官、著名汉学家。1833年来华，在广州为美国公理会创办印刷所。精通中文和日文。早年曾协助裨治文编《中国丛报》。1856年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兼翻译。1877年辞职返美，担任耶鲁大学汉文教授。编有《汉语拼音字典》（1874年），著有《简易汉语教程》（1842年）、《中国地志》（1844年）、《中国总论》（1848年）、《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1877年）等书。

③ 黄光域：《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1页；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第188、173、122、150、134、203页，中华书局，1985。

旅居已 15 年的戴德，写信给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 (Charles W. Eliot) 说：“返美后，得知欧洲大陆的许多大学以及英国的牛津大学已经设立中文讲座，耶鲁大学正打算仿效欧洲，聘请卫三畏博士担任汉文讲座教授。阁下，如您所知，这一切使我考虑筹集一笔基金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的可能性。”^①

戴德信中提出的方案的主要内容有：筹集一笔基金，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设立该讲座的目的在于为任何有决心学习中文的人提供学习条件，培养美国年轻人在中国担任高级职位以及在中国经商的能力，以促进中美两国的商务往来；达到该目的的方法是从中国聘请一两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到哈佛大学担任中文老师；在中国老师的指导下，利用可以得到的各种优秀教材，采用北京的外国学生所普遍使用的方法，在美国开展中国语言的学习。^②

促成戴德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提出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方案的动因主要是：第一，美国在华商务利益和传教事业的发展需要美国人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在 1784 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美国在华利益主要限于贸易和传教两个方面。在中美交往的最初 60 年里，中美两国政府间没有任何接触，既没有条约关系，也没有互派外交使节。尽管两国政府间的来往不多，但美国在中国的贸易、传教事业却发展迅速。自 1784 年“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到 1792 年的短短 8 年时间里，美国对华贸易就超过了荷兰、法国和丹麦，跃居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二位，仅次于英国。^③ 从

① Francis P. Knight to Charles W. Eliot, from Boston, Feb. 22, 1877, Harvard University Archives (hereafter abbrev. as HUA), UAI. 20. 877.

② Ibid.

③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14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97。

1791 年到 1841 年，美国对华贸易总额增长了 6 倍。^① 鸦片战争后，美国商人受到条约特权的保护，加之美国国内逐渐完成了工业化，更加刺激了中美贸易的发展。在美国东部沿海的波士顿、萨勒姆、费城、纽约等地，出现了一大批因对华贸易而致富的显赫家族和公司。

在传教事业方面，自 1830 年初美国最早的两名新教传教士雅裨理 (David Abeel, 1804~1846) 和裨治文 (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 抵达中国后，美国在华传教事业得到快速发展。自 1830 年到 1847 年的 17 年间，西方各国派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共 98 人，其中由美国派出者就多达 73 人，为英国此间派往中国传教士的 3 倍多，超过所有各国派到中国的新教传教士的 7/10，跃居新教各国在华传教事业的首位。^② 在 1844 年《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后，特别是在 1858 年《中法天津条约》及 1860 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传教士享有了更大的传教特权，为在华传教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1844 年之后，美国在华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口岸，特别是在上海，非常活跃。1858 年西方在华新教传教士为 81 人，到 1889 年时增加到 1296 人，其中美国传教士有 513 人，仅次于英国的 724 人。^③

美国在华商务和传教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商人和传教士认识到必须增加对中国的了解。当时的美国商人多半是依赖华人翻译或中国买办经办进出口贸易。由于语言不通，他们无法直接接触或获得有关中国市场的第一手信息。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工

① Foster R. Dulles, *The Old China Trade* (Boston and New York, 1930), p. 114.

②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47 页。

③ Paul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952*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3;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第 464 页。

具，掌握中文就能进一步了解中国。因此，美国人若要扩大在华事业，就应该首先学习中文。在中国有十多年生活经历的禀德对此深有体会，他在1877年2月致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的信中写道：“过去15年在中国商场和官场的经历使我相信，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犯了大错，即他们在抵达中华帝国时没有掌握该国的语言，而是一直依靠所谓的‘洋泾浜英语’，与此伟大帝国的臣民交往。近几年，美国在华商务和外交利益日益增大，而且我相信它们还会继续增长，直到变得比在东方其他国家的同类利益更为重要。美国在华利益的增长，使得此错误最令人痛心地点现出来。”^①在1879年10月致校长的信中，禀德还进一步说，他深信“我们在那里（指中国——作者注）的利益扩展如此之大，要求我们将来派出高质量的人才，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职位，也无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职位。”^②可以说，美国在华商务利益的发展是禀德提出方案的最主要的依据和最根本的动力。时任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约翰·L·西布利（John L. Sibley）曾说过，禀德提倡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座的“目的不是要教授中国文学，而是出于商业目的教授中国语言”^③。

第二，被迫开国的中国，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需要大批有专长的西方人才。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大门，开埠通商。清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日感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开始寻求革新，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自1860年后，清政府开始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1862年，清政府先是在北京

① F. P. Knight to C. W. Eliot, from Boston, Feb. 22, 1877, HUA, UAI. 20. 877.

② F. P. Knight to C. W. Eliot, from Shanghai, Oct. 22, 1879, HUA, UAI. 20. 877.

③ “The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rchives.

设立同文馆，后在上海、广州也相继成立类似的外国语学校。接着，清政府又以“自强”为目标，开始兴办军事工业，相继创立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兵工厂。为了满足兴办军事工业的需要，清政府还开始经营采矿、运输、电信、教育等事业，成立了轮船招商局、马尾船政局、天津电报学堂等等。

清政府创办洋务，无论是办企业还是办学校，在原料、资金和技术等方面均需依赖外国，尤其是需要有专门技术的外国人才。戴德非常敏感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将会为受过教育且又掌握中文、愿意在此谋求职位的美国年轻人提供各种机会，也是能为他们带来功名的最理想之地。在戴德看来，中国的各行各业都为美国的年轻人提供了成功的机会。他相信，在外交界，“今后美国的领事职位将由有能力的、学过所在国语言的人担任”^①。中国海关也会为熟悉中文的外国人提供若干发展机会。中国海关总署自赫德于1864年担任总税务司以来，为提高海关的办事效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合适人才，并在经济收入和晋升方面提供优厚待遇，吸引西方世界敢于冒险的年轻人。^② 哈佛大学毕业生杜德维（Edward B. Drew, 1843~1924）和耶鲁大学毕业生吴得禄（F. E. Woodruff）^③ 等就是此时被征入中国海关的。后经杜德维推荐，哈佛大学又有4位毕业生考入中国海

① F. P. Knight to C. W. Eliot, from Boston, Feb. 22, 1877, HUA, UAI. 20. 877.

② Jonathan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ers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Boston and Toronto, 1969), p. 115; Stanley F. Wright, *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Belfast, Mullan, 1950), pp. 268~269.

③ 吴得禄，美国人，耶鲁大学毕业后于1865年入中国海关，先后任镇江、汉口、厦门、广州、芜湖、汕头、淡水等口岸副税务司、税务司等职。

关，^① 他们分别是马士 (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墨贤理 (Henry Ferdinand Merrill, 1853~1935)、客纳格 (Charles C. Clarke) 和司必立 (W. F. Spinny)。这4位哈佛毕业生自1874年毕业后即考入了中国海关，工作非常出色，为鼐德提供了最好的例证。

在经贸方面，随着中华帝国的“对外开放”，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更为外国商人和银行家提供了诱人的前景。在土木工程方面，鼐德指出，“在中国，上海至吴淞已开通一条11英里的短小铁路，这被普遍认为是修建横跨整个中华帝国的庞大铁路体系——相当于现在横跨美国中西部的铁路——的开端”。他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事实应当能激发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追求功名和对通过勘探、电报及铁路手段使中华帝国走向文明有所贡献而努力学习”。^② 在采矿业方面，中国地大物博，矿藏资源极其丰富。鼐德指出，当时已有一名英国专家受聘于福摩萨煤矿行业，而且所有权威人士都坚定地认为，中国人一定会聘用外国采矿工程师。所有这一切足以吸引那些想在中国发财致富、获得成功和荣誉的年轻人学习中文。

甚至在律师行业，鼐德也认为中国是一个最能赚钱、非常有发展前途的地方。他指出，在香港和中国其他通商口岸已有外国律师营业，当时主要是英国律师。他们通过亲身经历，早已认识到他们在华事业的价值，并且“感到他们作为明智而尊贵的外国人，在工作中非常需要中文”。鼐德预测，随着更多口岸的开放，各口岸的会审公廨将应运而生，因此他指出，“未来的律师有希望跨出律师业已非常拥挤的美国，到竞争还很小的中国谋求有利

① F. P. Knight to C. W. Eliot, from Boston, Feb. 22, 1877, HUA, UAI. 20. 877.

② Ibid.

发展”。^①

第三，了解中国古老的文化，增进中美文化交流。在中国十多年的生活，蕙德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古老的文化，他相信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是美国所不具备的。蕙德认为，有必要加强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学习，“扩展西方世界与现在实际上仍被排斥在国际社会大家庭之外的人类的一个重要部分之间的交流”。^②他相信，美国人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和了解反过来可以丰富和发展美国文明。蕙德在致埃利奥特校长的信中写道：“对于旅行家、科学家及其他许多人来说，中国还是一个几乎没有开拓的领域，这将会吸引很多人。除薪水的考虑外，他们在这里会发现未曾涉足的一个国度和未曾涉猎的一种文学，两者内涵极为丰富。尽管我们可以教授科学知识，但是我们自己是远远不可能在人文科学方面获得一些宝贵的经验主义的知识的，这些知识是从遥远的古代发展而来的。”^③正如当时的一份报道所说：“通过为我们展示中国历史画卷，我们的视野将会得到多么大的拓展……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知识是多么地贫乏，我们的狭隘思想将会随着中文学习而变宽……任何外国人想要与中国人进行贸易而获利，或者作为本国政府的代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想要得到中国人起码的尊重，他必须完全了解中国人。”⁵

二、在华西方人关于蕙德方案的意见分歧

蕙德方案得到了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以及哈佛大学

① F. P. Knight to C. W. Eliot, from Boston, Feb. 22, 1877, HUA, UAI. 20. 877.

② Ibid.

③ Ibid.

5 “A Chinese Poet”, Ko Kunhua, General File, HUA, UAI. 20. 877.